

◀ (上接8版)

学青年》(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哲之《给初学哲学者的十二封信》(经纬书局1941年)等。其中夏瑞民(本名顾其城)的《致青年》1936年曾改名《致青年——给青年的十三封信》重新包装上市,作者署名改作“朱光潜”,封面设计与《信》相近,故意混淆视听。朱光潜发现后,撰文《朱光潜给朱光潜——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载1936年4月16日《申报》)予以揭露。另有一本1939年长风书店(即棠棣出版社)初版的《个人与社会——给青年的二十四封信》,1946年被改头换面成《给青年二十四封信》,封面也仿照《信》,署朱光潜著。该书原署名林萍,系盗用茅盾、李石岑、孙本文、萧一山、严景耀、胡愈之、潘梓年、平心等十多人的文章拼凑而成的伪书。

1947年朱光潜估计的二十万册销量当是基于开明版的保守数字,大量盗版则无法统计。《信》一面市便成了盗版书商的猎物,1929年5月的第二版被人以“上海三民书局”名义原样翻印。第三版后更改封面的版本则遭到“爱丽书店”盗印,版权页杜撰为“1931年6月四版”,甚至被误编入朱光潜作品目录(温笑俐编《朱光潜著译目录》,《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555页)。两家盗印者均为空头招牌,在各上海出版机构名录中无案可查。盗版也流向了上海之外,1932年5月,北平警方派员大规模搜查取缔盗版书商,查获的翻版书中便有《信》,属“伪版书,纸质恶劣,印刷不良”(《各种被翻书籍一览表》,载《中国新书月报》2卷4-5号)。1933年2月,察哈尔省城张家口一间书店内也曾被查出《信》的盗版(《张家口查获翻版书情形》,载1933年2月21日《申报》)。

除原样翻印的以外,《信》在东北还出现过一特殊的盗版。这一版本袭用1938年叶圣陶题签的黄色封面,版权页信息标注详尽,为“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日”在大连实业印书馆印刷,“康德十年九月五日”由“奉天”(沈阳)东方书店发行,由总部在“新京”(长春)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总批发,编辑人朱楠秋,发行人何一鸣。此版(下称“康德版”)使用传统式标点排印,正文112页,虽与原书篇幅相近,内容却缩水不少,文字经过精心篡改,从中可窥见伪“满洲国”出版审查的标准和操作手法。



“康德版”封面(左)和版权页(右)

“康德版”删掉了卷首的夏丏尊序言,十二封信中仅有第二信和第七信,以及附录一《无言之美》不变,其余均有程度不等的删改,有几处甚至整页删除。前半部分删改的尺度较严,后半部越发马虎。删改的一大目标是淡化“敌国”色彩。《信》多处援引欧美国家的事例,如第一信提到“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弗兰克林”,被改为“外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达尔文“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的事迹则全部删除;作者“调查了英国几个公共图书馆”一句中,“英国”二字被删去。朱光潜在第一信里还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欧美名著和自己喜爱的中外作品,标有英文原名的书目被整体移除,提到的中国古籍也未保留,少了整整两页。全书中,专名后所附的外文原名都是需删除的对象。欧美人物如只写名字,未提国籍,大都可以保留,但有一个滑稽的例外。第七信写到许多西方大学者擅长多种学问,举亚里斯多德、康德、歌德、斯密、罗素为例。其他几位西方哲人的事迹均原封不动,“康德在大学里几乎能担任一切功课的教授”一句,“康德”则被突兀删去,仅留下一个无主语的句子。1934年,伪“满洲国”执政溥仪改国号为“大满洲帝国”,年号改为“康德”。在“康德皇帝”治下,“友国”的古人康德竟也成了忌讳。

以伪“满洲国”的立场,日本和中国更是敏感词,不提为妙。第六信写到“日本民族是一个有生气的民族,因他们中间有人能够以嫌怨杀人,有人能够为恋爱自杀。我们中国人随在都讲中庸,恋爱也只能达到温汤热”。前一句本属正面评价,也遭删除;后一句则被改为“我们国人……”全书指代本国的“中国”通常改作“我国”或被去掉。如第七信“现在中国社会还带有科举时代的资格迷……希望掇拾中国古色斑斑的东西

去换博士”,前半句“中国”一词被删,后句改为“我国”。附录二《悼夏孟刚》中,朱光潜曾任教的“吴淞中国公学”竟被更名“吴淞学校”。但也有少数语境例外,如第七信“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并未改,大约可视为与己无干的三个外国并列。

《信》写于1920年代,紧承新文化运动的余音,以落后的社会和国民劣根性亟需改造为共识基础,不乏愤激批判之语。“康德版”中,对社会或某一群体做出尖锐批评的内容均遭删改。如第一信里“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又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被改为“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放荡无羁荒僻邪侈……”。第五信批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号召打破偶像,莫在浮嚣中沉沦等近两页内容悉数被删。“人是一种贱动物,只好模仿因袭,不乐改革创造”被改为“人有一种恶习惯……”,“社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被改为“社会有极重的压迫力”。如第三信写到“街上有个乞丐,旁人见到他也许立刻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后半句变成了“要建设慈机关”。《悼夏孟刚》认为人生应采取“绝不不绝世”的态度,“我自己不幸而为奴隶,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这个奴隶制度,为他人争自由。”“康德版”则改写为“我自己不幸而为屈服,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这些,而为他人创造幸福”。

“康德版”删改最大的是第四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题目被改成“谈中学生与社会”,不仅删得支离破碎,部分文字等于重写。如以下一段:

中国人蜂子解蛆的心理太重,只管煽动人“类我类我!”比方我喜欢谈国事,就藐视你读书;你欢喜读书,就藐视我谈国事。其实单面锣鼓打不成闹台戏。要撑起中国场面,也要生旦净丑角俱全。我们对于鼓吹青年都抛开书本去谈革命的人,固不敢赞同,而对于

愚参与爱国运动为厉禁的学校也觉得未免冤枉过正。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说不通。若谈事实,则这一代的青年,这一代的领袖,此时如果毫无准备,想将来理乱不问的书生一旦就变成措置咸宜的社会改造者,也是痴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宁的国家里,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用不着学生去干预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国,又另有说法。民众未觉醒,舆论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张去监督政府,也并不算越职。总而言之,救国读书都不可偏废。蔡子民先生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两句话是青年人最稳妥的座右铭。

“康德版”改写为更加中庸世故的立场:

我国人蜂子解蛆的心理太重,只管煽动人“类我类我!”比方我欢喜作的事,就藐视你作的事,你欢喜作的事,就藐视我作的事。其实单面锣鼓,打不响闹台戏,要撑起社会场面,也要生旦净丑,角角齐全。所以我们对于鼓吹青年,希望他们都要加以谨慎,先将自己学业护得相当把握,那时候再平稳走向社会去亦还不迟,并且决不致于失败的。但据一般人来说,什么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说不通。若谈事实,必然在学生时代还用不着去顾虑到社会的一切,可是其究竟,也不真是越轨,亦是学生应蓄意的天职。

此信结尾两段原作:

总而言之,到民间去!要到民间去,先要把学生架子丢开。……现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还没有根本改变。学生们自成为一种特殊阶级,把社会看成待我改造的阶级。这种学者的架子早已御人于千里之外,还谈什么社会运动?你尽管说运动,社会却不敢高攀,受你的运动。这不是近几年的情形么?

老实说,社会已经把你我们看成眼中钉了。这并非完全是社会的过处。现在一般学生,有几个人配谈革命?……你也许说,任何团体都有少数败类,不能让全体替少数人负过。但是青年人都过于自尊的幻觉,在你谈爱国谈革命以前,你总应该默诵几声“君子求诸己!”

“康德版”却变成了:

总而言之,刚要迈到社会漩涡里的时候,先要把你学生时代的私生活和素常举止动作的态度,得完全的改造一下子,并且更得先领略这处世的哲学,那才行呢!社会是须要人们自己去向着它的转移方向作去,那时才能得到了生存和立足巩固的根基。

老实说现在一般学生,有几个人能谈得到,革新社会和真实的认识社会的一切,他的失败原因,还不是犯了青年都过于自尊的幻觉,所以在未踏入社会以前,总

应该默诵几声“慎于从事”。

“康德版”外观与原版近似,不易分辨。网上出售过一本1944年7月再版的“康德版”《信》,内中写有“浙江学校图书馆惠存”、“一九四七年初三女毕业班赠”字样,可见此版已从东北流入其他地区,直到抗战后仍有读者上当。

朱光潜于1933年结束留学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活跃在京派文人圈,抗战前夕曾卷入与左翼阵营的论争。1941年加入国民党后,他相继当选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受到郭沫若、邵荃麟、蔡仪等人的集中批判。1949年后,从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起,朱光潜步入了不断被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生涯,曾风靡全国、影响深远的《信》,也成为他“毒害青年”的代表罪状。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光潜对《信》做出了深入检讨,表示它“流露着买办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标榜个人享乐主义和看戏的人生观”。“我要把青年们从革命运动中引诱出来,我的动机完全是反革命的。”[《朱光潜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的检讨》,载1952年3月29日北京大学《三反快报》(铅印版)第3期] 1962年,曾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宋云彬撰写回忆文章时,还将《信》举为开明出版物的反面典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现在看来,是颇有问题的。”(宋云彬《开明旧事》,《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29页)

“文革”结束后,朱光潜恢复了政治地位,著译陆续出版或重版。《信》也一度计划重刊,最终被认为内容过时,“领导上不赞成出”(1982年3月20日朱光潜致陈望衡,《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606页)。1986年,朱光潜病逝,没能看到《信》再版。1987年,他家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将《信》收入其中,个别词句有所改动。1988年,开明出版社在民进中央管理下成立,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出任社长。开明出版社从1992年起推出“开明文库”系列,将开明书店出过的著名新文艺书籍陆续重版。《谈美》收入文库第二辑,《信》收入1996年8月初版的第三辑,这也是1949年后《信》的首个单行本。2000年后,十余家出版社相继重版《信》。这本曾在民国热销二十年不衰的《信》再度成为畅销书,滋养着新世纪青年的心灵。